

范蔚 总主编

陇上学人文存

史苇湘卷

甘肃人民出版社

陇上学人文存

史苇湘 卷

史苇湘 著 马 德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



0198449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陇上学人文存·史苇湘卷/ 范鹏总主编; 史苇湘著;
马德编选.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226-04336-3

I. ①陇… II. ①范… ②史… ③马…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②敦煌学—文集 IV. ①C53 ②K870.6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198471 号

责任编辑: 王建华

封面设计: 王林强

陇上学人文存·史苇湘卷

史苇湘 著 马德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13.75 插页 7 字数 344 千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978-7-226-04336-3 定价: 60.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印厂联系)

《陇上学人文存》编委会

名誉主任：王三运 刘伟平

主 任：连 辑 咸 辉

副 主 任：张建昌 张瑞民 范 鹏

委 员：连 辑 咸 辉 张建昌 张瑞民
范 鹏 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 炯 安文华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学术指导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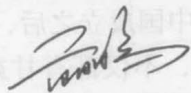
《陇上学人文存》编辑部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总序



陇者甘肃，历史悠久，文化醇厚。陇上学人，或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学者，或外来而其学术成就多产于甘肃者。学人是学术活动的主体，就《陇上学人文存》（以下简称《文存》）的选编范围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学术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存》精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甘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每人辑为一卷，或标时代之识，或为学问之精，或开风气之先，或补学科之白，均编者以为足以存当代而传后世之作。《文存》力求以此丛集荟萃的方式，全面立体地展示新中国为甘肃学术文化发展提供的良好环境和陇上学人不负新时代期望而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新贡献，也力求呈现陇上学人所接续的先秦以来颇具地域特色的学根文脉。

陇原乃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人文学脉悠远隆盛，纯朴百姓崇文达理，文化氛围日渐浓厚，学术土壤积久而沃，在科学文化特别是人文学术领域的探索可远溯至伏羲时代，大地湾文化遗存、举世无双的甘肃彩陶、陇东早期周文化对农耕文明的贡献、秦先祖扫六合以统一中国，奠定了甘肃在中国文化史上始源性和奠基性的重要地位；汉唐盛世，甘肃作为中西交通的要道，内承中华主体文化熏陶，外接经中亚而来的异域文明，风云际会，相摩相荡，得天独厚而人才辈出，学术思想繁荣发达，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甘肃相对于逐渐开放的东南沿海而言成为偏远之地，反而少受战乱影响，学术得以继续繁荣。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



后方，接纳了不少内地著名学府和学者，使陇上学术空前活跃。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是为国家民族的新生而欢欣鼓舞，全力投入到祖国新的学术事业之中，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众多知名专家，在历史、文献、文学、民族、考古、美学、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均居全国前列，影响广泛而深远。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几次对当代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争鸣，不仅都有甘肃学者的声音，而且在美学三大学派（客观派、主观派、关系派）、史学“五朵金花”（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点研究的历史分期、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等五个方面的重点问题）等领域，陇上学人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学者更是如鱼得水，继承并发扬了关陇学人既注重学理求索又崇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甘肃学者新的风范。宋代西北学者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中华学人贯通古今、一脉相承的文化使命，其本质正是发源于陇原的《易》之生生不已的刚健精神，《文存》乃此一精神在现代陇上得到了大力弘扬与传承的最佳证明。

《文存》启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在选择入编对象时，我们首先注重了两个代表性：一是代表性的学者，二是代表性的成果，欲以此构成一部个案式的甘肃当代学术史，亦以此传先贤学术命脉，为后进立治学标杆。此议为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首倡，随之得到政界主要领导、学界精英与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与政府大力支持，此宏愿因此而得以付诸实施。

为保证选编的权威性，编委会专门成立了由十几位省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著名学者组成的专家指导委员会，并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研讨、发放推荐表格和学术机构、个人举荐等多种方式确定入选者。为使读者对作者的学术成就、治学特色和重要贡献有比较准确和全面的了解，在出版社选配业务精良的责任编辑的同时，编委会为每一卷配备了一位学术编辑，负责选编并撰写前言。由于我院已经完成《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古代至1990年卷，1990至

2000年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文存》的选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基本依据,加之同行专家对这一时期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研究,使《文存》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同期内甘肃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状况。

我们的愿望是坚持十年,《文存》年出十卷,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达至百卷规模。若经努力此百卷终能完整问世,则从1949至2009年六十年间陇上学人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献身学术、追求真理的轨迹和脉络或可大体清晰。如此长卷宏图实为新中国六十年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全部成果的一个缩影,亦为此期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业绩的一次全面检阅,堪作后辈学者学习先贤的范本,是陇上学人献给祖国母亲的一份厚礼。此一理想若能实现,百卷巨著蔚为大观,《文存》和它所承载的学术精神必可存于当代,传之后世,陇上学人和学术亦可因此而无愧于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并有所报于生养我们的淳厚故土。

因我们眼界和学术水平的局限,选编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未曾意料的问题,我们衷心期望读者能够及时教正,以使《文存》的后续选编工作日臻完善。

是为序。

2009年12月26日

编选前言

(一)

非常高兴地接受《陇上学人文存·史苇湘卷》的编辑任务。史先生是敦煌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从事敦煌壁画临摹和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历史研究五十多年,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和奠基作用,在敦煌学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永远彪炳史册!

史苇湘先生 1924 年出生于四川,1948 年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到敦煌,先后从事洞窟内容调查、壁画临摹、资料整理、史地考察、理论研究等工作,1980 年开始正式发表学术论文。1994 年敦煌研究院在建院五十周年之际,原计划为包括史先生在内的一批专家出版论文集,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果,而且史先生送交的几篇论文在有关单位的相互移交交接过程中被丢失,给后来的编辑工作造成一定困难。1998 年年初,出版过大量敦煌学术著作的甘肃教育出版社的负责同志,到史先生家中拜访先生,希望能为先生出版专著;史先生同意了此事,并定书名为《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由出版社列入 1998 年的出版计划。先生为此夜以继日地工作,但由于学术专著体例上的要求与论文集不同,有许多内容需要补充,已经发表过的论文有一部分也需要作调整,工作量相当大,以至于书稿未能按期交付。1999 年 5 月先生因中风病倒,到 2000 年 1 月 26 日先生辞世的 8 个月时间里,书稿的编纂工作不得不停了下来。2000 年 4、5



月间,笔者受史先生家人及甘肃教育出版社之托,按照先生生前的意愿,从能够找到的史先生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60多篇论文(部分是手稿)中,选取36篇,60余万字,整理编辑成《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一书,作为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文集》系列的重要著作、甘肃教育出版社策划的《敦煌研究丛刊》的首选专著,于2002年相继出版。本文存即是从《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选取部分章节,同时另外搜集到史先生的部分手稿编辑而成。

史先生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历史、艺术和宗教三大领域的方方面面。如人文、地理、石窟考古、中外交通、雕塑、绘画、文献、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民俗民情、文化教育等,与他钟爱一世并毕生为之奋斗的敦煌石窟的博大精深一样,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整理资料、临摹壁画、博览群书,慎思明辨,史先生一生就是在这样的勤奋中度过。他整理的敦煌石窟资料,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史先生成功地创立并运用敦煌本土文化论、石窟皆史论等完整的敦煌历史与艺术研究的理论体系,并始终站在国际学术的前沿阵地,在长期从事壁画临摹、熟知敦煌艺术内容的基础上,得心应手地运用各学科的方法手段研究敦煌石窟佛教艺术。史先生的研究成果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将在敦煌学术领域内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史苇湘先生一生主要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建树,大体说来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国际学术的前沿阵地——艺术社会学。史先生是最早运用艺术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的专家,反映了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先见之明。史先生在好几篇文章中都反复强调这一问题。敦煌石窟虽然也出自于佛教艺术,但它同时又是具有家庙性质的社会化(世俗化)活动场所;窟内塑像、壁画的内容虽然也出自佛教经

典,但反映更多的是社会和窟主的需要;窟主、施主们要求工匠们按自己的审美观来塑他们心目中的神,而工匠们也则是将自己对佛教的理解、窟施主的要求和自己对社会的认识等方面糅合到一起,最终创作出现存于石窟里的佛、弟子、菩萨、天王、力士、夜叉等等。因此,研究敦煌佛教石窟艺术,主要的不是从佛教的教派、教义方面去认识,而是要从历史与社会的大背景下去认识,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和认识敦煌石窟的内涵。

二、敦煌历史文化(包括佛教文化)的正本清源——敦煌本土文化论。受陈寅恪先生的启发,在陈先生河西文化的基础上提出敦煌本土文化论:以汉文化为基础,吸收和融合各种外来文化所形成的敦煌特色的本土文化。汉晋时期敦煌的封建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与兴旺发达,佛教进入中原之前在敦煌所进行的适应性自我改造,都成为敦煌本土文化的特有现象。198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举办的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讨论会上,史先生就这一问题做了详细的说明。

史先生有句名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造一方神,一方人造一方净土。这是先生对艺术社会学的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艺术社会学与本土文化论的有机结合。收入本文集的《地方因素是研究佛教艺术的起点和基础》,就是专门论述这一问题的,文中举出榆林窟第25窟壁画例子,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特别强调了佛教艺术的地方因素,指出这个问题从东晋、南朝时候开始,中国大江南北出现的佛教造像就已经展现出这一历史现象。敦煌因地接西域,出现的稍晚一些,但最晚也是在北魏后期。至于隋唐以后的中国各地的佛教造像和其他佛教艺术品,就是其所在地区的历史与社会的产物。

三、史先生一直将敦煌石窟看做中古时代千年历史形象的博物馆,在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启发下创立石窟皆史论。史先生常说:敦



煌石窟里装着中国古代一千年间的历史；石窟艺术只是作为历史上反映各个时期的现实社会的一种形式。所以，史先生一直将敦煌石窟当做历史来读，用历史的记载来说明石窟，用石窟的形象去证明历史。如莫高窟第445窟的曲辕犁图像的发现，莫高窟北周和隋代的《福田经变》的发现与研究，莫高窟第321窟的《宝雨经变》的研究等等，都是以史论窟、以窟证史方面的典型范例。本书中的许多篇章，都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文化艺术、佛教信仰、中西交通、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等社会问题。史先生创造性地将唐代敦煌石窟艺术分为初、盛、中（吐蕃）、晚四期，并根据敦煌地方的历史特点和敦煌石窟的内容、风格等划分出四个时期的年代界限。

应该说，成就史先生敦煌研究业绩的基础，首先是他从事了多年的壁画临摹工作。而先生临摹壁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照猫画虎，不是纯粹的技法上的摹写，而是用“心”去体会、去认识敦煌壁画，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临摹即研究。通过壁画认识历史，认识古代社会，认识古代文化，认识民族精神。同时，史先生较早地注意到敦煌遗书中的文学作品与敦煌石窟艺术的关系，将遗书文献资料与石窟图像数据进行互证研究。

正如先生自己常用苏东坡的话“功夫在诗外”来形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那样：“功夫在窟外。”研究敦煌石窟的功夫不仅在于自己对石窟的了解和掌握，更重要的还在于自己对石窟的感情和对石窟以外的事物的了解。先生十分注意听取圈外专家甚至是普通观众提出的一些意见、建议和想法；先生认为，往往这些非专业人士提出的一些问题，如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哲学等方面；普通观众关心的问题，如为什么会这样，又为什么会那样，等等，正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正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然，外人只是提出问题，而要真正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还

得靠我们这些从事专业研究的人去下工夫探讨。史先生很早就注意到这一方面,他不断地根据社会的需要和研究事业的发展,不断地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所以他的研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他的文章普遍受到推崇。

在敦煌石窟中,有一个被学术界和佛教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就是中唐(吐蕃占领敦煌)以后,洞窟中的经变画的种类突然增多,一窟中出现十多种或二十多种经变画,从佛教本身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不能解释的,因为这些经变画所依据的佛经和代表的经义,代表着佛教的各宗各派,一般说来,这些宗派是无法融进一窟的。史苇湘先生很早就认为这是一种现实社会需要的反映,他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指出,中唐时期,“……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在此情况下,佛教要解答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要掩盖社会中的疮痍,只用一两种经义、一两种经变就不够了。经变画是经典的图解,佛教需要用更多的经典变相来为现存的社会制度辩护,需要用更多的虚幻的来世景观来缓解人民眼前的痛苦。因此产生这种艺术现象的原因,正在于当时沙州社会存在着空前深重的苦难,决不能简单地看做是佛教内部的变化”。这个回答无疑是正确的,这就是从历史和社会的大背景下去认识这一问题。这是一条总的原则,无论历史怎样发展,无论石窟内容如何变化,也无论我们现在的人和后来的人如何去认识去研究,都不会脱离开这一原则。史先生虽然讲的是吐蕃时期的情况,但后来的张、曹归义军时代的石窟壁画内容,同样证明了这一论断。

史先生在从事敦煌佛教艺术的内容、形式和历史背景考察的同时,从艺术哲学的高度对敦煌石窟艺术进行了深入研究,而且是在理论研究不被看好的时代里艰难地从事这一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空前高涨。但由于国内历次运动,理论界曾一度出现了混乱现象。在学术研究领域内,理论问题差不多成为人们比较忌讳的话题。



史先生不仅独具慧眼,而且是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从容不迫地进行敦煌石窟艺术基础理论研究,为敦煌石窟艺术以及整个敦煌研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史先生最早认识到敦煌艺术作为精神财富的价值,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都多次提到这一点。这不仅仅是对敦煌石窟艺术而言,即使是对整个的文物和文化遗产而言,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先生还就利用敦煌艺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发挥更广泛的作用方面,提出过科学合理且具有前瞻性的建议。

史先生在敦煌历史和敦煌艺术的研究方面的成果,不仅为后来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成果在敦煌历史与艺术研究理论上的指导意义。毫不夸张地说,眼下许多敦煌历史和艺术方面的研究成果,都是在史先生成果的基础上,或在史先生研究理论的启迪下做出的。先生在许多方面都留给后来者以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无论是基础知识还是基础理论,史先生在敦煌研究领域里都是原创性的研究;很多问题,无论是基础知识还是理论、方法,都是在史先生的大作首次提出;在许多领域内,特别是敦煌艺术理论范围内,史先生都是开拓性的研究。比如说,关于敦煌石窟艺术与敦煌历史文献、佛教文献的结合研究,在史先生之前,也只有向达先生做过一些,另有姜亮夫先生也涉及过,但他们并没有将文献资料与石窟资料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即使到今天,将两者很好地进行结合研究的学者也是寥若晨星。最早真正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将石窟的图像、形象与文献的描述、记载以及当时敦煌的社会历史背景相结合,进行深刻地分析研究,史先生也是开拓者。

(二)

这次选编,是在《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出版十年之后,听

取了广大读者特别是众多敦煌学界的专家和学者、众多敦煌研究的初学者的意见,作为每一位敦煌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书、基础工具书的要求,做以分类选编。

前面提到,《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是史苇湘先生自己拟定的书名,编辑时先生已经仙逝,只当就按照历史和艺术两大类来编辑。实际上,作为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我们前面也已经说到,史先生的研究涉及各个方面,包括许多重大的艺术理论问题,所以在这次本文存编辑中,以基础理论和方法为主,侧重于基础研究类、奠基类的力作,我们将史先生的论文分为六大类: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史、敦煌本土文化与敦煌佛教艺术、敦煌艺术社会学与敦煌艺术哲学、敦煌断代艺术研究、敦煌艺术专题与个案、敦煌艺术的研究与开发。诚如先生生前一直所强调的那样,他一直做的是基础工作;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是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手段,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无论是现象还是本质,无论是艺术表现还是社会背景,史苇湘先生用一生的心血为后来的敦煌研究者奠定了雄厚的研究基础,他的著述都是敦煌研究的奠基之作。只是由于篇幅所限,本文集忍痛舍弃断代艺术研究一编,其他各篇也只选取了部分内容。

第一编是敦煌历史与敦煌石窟艺术史,这是敦煌研究的基础的基础。原本想将花了史先生一生心血的、作为敦煌研究的基础性资料《敦煌历史大事年表》编入,但考虑到体例,以《敦煌史略》代之。《关于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是一部敦煌石窟艺术通史,也被编入。另外《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是先生早年的力作,是敦煌历史与艺术的浓缩,这次也因篇幅所限没有收入。所以这一部分只收入两篇论文,但也是分量极重的论文。

第二编是敦煌本土文化与敦煌佛教艺术,收入了《敦煌佛教艺术的基础》、《敦煌佛教艺术产生的历史依据》、《世族与石窟》、《论敦煌



佛教艺术的世俗性》四篇论文,其中《敦煌佛教艺术的基础》是新收入先生文集的论文。这些论文从各个角度以汉晋文化为基础、充分吸收外来文化并融合为敦煌本土文化,作为敦煌佛教艺术的基础文化,形成史先生“本土文化论”的理论体系的方法。

第三编是敦煌艺术社会学与敦煌艺术哲学,收入《产生敦煌艺术审美的社会因素》、《再论产生敦煌艺术审美的社会因素》、《敦煌佛教艺术的想象力》、《信仰与审美》、《形象思维与法性》五篇论文,这些论文是史先生立足于艺术科学的前沿阵地,并将基础理论与新型理论相结合的明证。

第四编是敦煌艺术专题与个案,收入《珍贵的敦煌彩塑》、《丰富的敦煌图案》、《敦煌壁画中的乐舞图像》、《敦煌石窟故事壁画在中国美术史上的价值》、《从敦煌壁画〈微妙比丘尼变〉看历史上的中印文化交流》、《莫高窟中的福田经变》、《莫高窟中的宝雨经变》、《刘萨诃与敦煌莫高窟》八篇文章。在研究工作中,经常有新的发现是一件很愉快也很兴奋的事,但没有一定的研究基础,是很难在研究中有新发现的。史先生正是由于基础扎实,学识渊博,所以在石窟壁画中不断有新内容的发现,如“微妙比丘尼变社”、“福田经变”、“宝雨经变”等,就是先生在研究中首先发现的内容。在研究这些新发现时,由小而大,由浅入深,既有具体的内容和情节的准确介绍,又有历史与社会背景的精辟分析。

第五编是研究与开发,收入《地方因素是研究佛教艺术的起点和基础》、《临摹是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方法》、《敦煌佛教艺术审美与敦煌文学的关系》、《关于开发敦煌艺术的意见》四篇论文,其中最后一篇是新收入的论文。

虽然我们做了以上分类,但史先生在研究中,特别是一些理论性的论文,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如本土文化论、石窟皆史论、艺术社会

学、艺术哲学甚至人类学等方面都相互交叉,相互印证。如先生晚年力作《临摹是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方法》,不仅仅是讲临摹工作本身,实际上是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的理论方法的总结。

需要说明的是,史先生论著的大部分章节,都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写作时间更早一些;而当时的研究条件是十分有限的,首先是资料的匮乏,特别是连敦煌遗书的资料都很难看到;再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研究经费,没有办法出去考察。大概没有人会相信:研究了一辈子敦煌石窟艺术的史苇湘先生,连新疆都没有到过,没有看到过吐鲁番和龟兹石窟!另外,先生一直是个人孤军奋斗,从来只有他为别人提供资料,而没有任何人能为他提供任何一条资料。所以,文章中可能有些数字和号码上的错误,包括一些现在看来略显简略的注释文字,都丝毫不影响先生在敦煌研究方面的成就。

(三)

史先生又是一位艺术家、绘画和临摹是成就他事业的基础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史先生还是位诗人,虽然他留下来的作品不多,也很少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但从他的诗中还是可以领略到他的人格魅力。借文存编辑之际,我们从先生的伴侣、老一代敦煌艺术家欧阳琳先生抄录的史先生的诗作中选取如下几首,以飨学界:

望星空——1974年9月秋夜

静观群星似无声,宇宙何尝瞬息宁?鼓噪喧腾从未已,变化运转焚自身。

有生有灭由自在,无始无终互依存。离群索居何可美,不赏陨落一孤星。

归途(过张掖)

南山北山咫尺间,铁路丝路两千年。夕曛照我西归路,蹟上